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程斯宇

内容提要 1942年春至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关键词 整风 审干 华北抗日根据地 北方局 抢救运动

1942年2月上旬,以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作标志,一场内容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①的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两个不平衡:一是对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整风关注较多,对广大敌后根据地整风探讨得少^②;二是对除审干之外的整风运动介绍得多,对审干问题细致研究得少。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初步探讨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并把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审干问题作为重点展开论述。^③本文之所以将包括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晋绥四大根据地的华北确定为研究地域,主要因为中共在该区域内的根据地分布最广、组织力量最雄厚、局部执政实践最丰富,展开整风审干运动的过程中自然会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

^①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2月1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解放日报》,1942年4月27日,第1版。该文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

^②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目前除陕甘宁根据地外,对其他根据地、各中央局、八路军办事处等的整风基本没有研究。”(任责祥:《延安整风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4期,第75页)

^③ 李里峰简要介绍过山东整风审干的基本方法、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不过其所涉审干并不都是整风期间的。(参见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224页)蒋艳平的研究虽展现了华北整风的基本进程,但对审干的讨论偏重于“抢救”阶段。(参见蒋艳平《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整风运动》,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2012年,第31—42页)上述成果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启示,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有可深入之余地。

一、从学习到审干

中共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基本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及各中央分局依照上级相关指示具体领导的^①，前后历时3年多。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华北的最高派出机关，始终密切关注延安的各种政策动向。1942年初中央发出整风号召后，北方局宣传部于3月3日通知各分局、区党委：今年的“五五学习节”，应“使党内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首先从干部教育中生动的具体的实现起来”。^② 华北的整风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通称第一个“四三决定”），对阅读讨论中央文件的方法、目标、时间规划等作了详细说明，并规定应重点学习的文件篇目。^③ 这一决定使整风演变为一场“学习运动”。华北各地在整风之初多以“三风”为框架，检讨本区工作之不足。太岳区较早吸收“四三决定”精神，抓住“学习”这个核心。4月16日，该区党委发出整风指示，效仿延安也将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但未作细致部署。^④ 10天后，北方局宣传部对整风学习作了较详细的安排，并表示“华北敌后是处在战争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因之阅读与讨论时间，应较延安长一些”，规定讨论整风文件时间为5个月，“平原地区，尚可延长一个月到两个月”。^⑤ 但是，运动在华北未能按部就班地展开。

从1941年春开始，日伪在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旨在彻底消除以中共为主的抵抗力量威胁”。^⑥ 至当年秋季，已给各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八路军副总司令、时任北方局书记彭德怀表示：“一年来我根据地缩小了约六分之一。特别是在统制舆论，进行武断宣传，散布失败情绪方面，在收买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方面，在制造汉奸、利用叛徒方面，敌人都有了不少的收获。”^⑦ 进入1942年后，日伪“扫荡”持续，华北“斗争之艰苦与残酷，实空前未有”。^⑧ 敌后整风只能个别、分散地开展。由于“根据地军民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投入反‘扫荡’作战，所以整风文件的学习时断时续”。^⑨ 各地规划的整风进度也无法一致。例如，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直到1942年10月才制定学

① 根据地初创时，华北各地党组织均受重建后的北方局领导。此后，抗战期间中央又在华北先后成立过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太行分局、平原（冀鲁豫）分局。（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131、143、153、176、177页）由于各根据地为敌方势力所切割，处于分散状态，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中央局、中央分局具备一定自主性。北方局坐镇太行，对晋冀鲁豫整风的领导比较直接。（参见陈鹤桥《邓小平在北方局工作时的几件大事》，《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晋察冀、山东的整风分别由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具体领导，北方局主要配合中央作一些指导工作。从1943年4月起，晋绥分局改归西北中央局领导，与中央联系较紧密。

② 《中共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整顿三风发表关于五五学习节的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第1版。

③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364页。

④ 中共太岳区党委：《关于深入研究中央决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16日），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344页。

⑤ 《中共北局宣传部关于研究讨论廿二种文件的通知》，《抗战日报》，1942年5月5日，第1版。

⑥ 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1页。

⑦ 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1941年11月1日），《抗战以来选集》第2集中册，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编印，第85页。

⑧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7日，第1版。

⑨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习计划,比前述北方局规定整整错后了5个月。^①而1942年冀南区的整风“还未真正开始”。^②两区地处平原,战争压力更大,这也是其整风进度落后的主因。

中央对华北的整风密切关注。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③2月10日,毛又致电各地方党领导人,要求汇报1942年整风情况^④,可见中央督促甚急。此时北方局已认识到华北整风的问题,并准备解决。^⑤2月5日,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⑥要求重新动员整风。^⑦随后,各地纷纷制定更加详细的整风计划。与此同时,为将运动推向深入,北方局及各分局、区党委还依托原有或新开办党校集中干部整风,有的地方还开办了专门的整风学校或训练班。北方局认为,该做法的优点在于“使实际工作中的干部,得到专门阅读文件、思考问题、整理工作、反省自己的相当机会”。^⑧

华北紧锣密鼓地重振整风学习之际,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由“学习”进入了“审干”阶段。前述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已提及审干问题,称干部教育须“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⑨然而,该电精神未能立即体现在北方局2月5日指示中。新一轮的审干,要与整风学习紧密结合,此乃中央的“新精神”。晋绥根据地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1943年1月下旬,晋西北军区明确表示:“在深入整风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审查,对每个干部党员作全面的历史的鉴定”,同时“一面依靠干部的自觉反省,一面从他的自传书和总反省笔记中加以组织上的审查”,发现优良模范干部,帮助落后干部进步。^⑩

1943年2月,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整顿‘三风’是审查干部的最好的办法之一”,能从“思想上来了解干部”。过去的审干“犯了严重的形式主义,要干部背着包袱来听审,粗枝大叶谈谈话”,这是对审干的讽刺,应引以为鉴。^⑪同月做出的分局高干会结论和北方局组织部《关于整风审干的指示》,都吸收了彭的讲话精神。^⑫3月18日,晋西北区党委指示称:整风中配合审干“不仅能全面地了解干部,而且能充实整风学习的内容”。^⑬近半个月后,太岳区也开始强调:今

① 参见《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学习二十二种文件的指示》(1942年10月),张玉鹏、张文杰编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② 《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今后十个月的工作方针》(1943年6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页。

③ 《毛泽东关于敌后形势和当前的中心任务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95页。

④ 毛泽东:《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⑤ 1942年末,北方局制定的1943年工作计划未提及整风问题,并非不重视,而是要发专文指示。参见《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1943年2月1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⑥ 1942年6月底,北方局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合并,对军队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名义,对地方党组织用北方局名义实施领导。

⑦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2月5日),《八路军·文献》,第899页。

⑧ 《中共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1943年7月9日),《解放日报》,1943年8月2日,第1版。

⑨ 《毛泽东关于敌后形势和当前的中心任务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八路军·文献》,第894—895页。

⑩ 《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对一九四三年政治工作的指示》(1943年1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⑪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1943年2月8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99页。

⑫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547页;《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综合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⑬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年要特别在整风中去审干,以反省笔记作为审干主要材料之一。^①

4月3日,中央做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对审干、反奸工作进行了安排。^②此后,北方局对中央意图的理解日益加深,其5月所发指示更加明确提出把审干与整风学习密切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组织的审阅研究”干部的“反省自传、历史思想自传和反省笔记”。这样既可“得出对干部培养教育的经验和理论,并且也可能暴露和发现个别品质坏的和个别隐藏的奸细”。^③不过,直到1943年夏,华北的整风审干还未全面展开。例如,太行分局党校3月至8月开办的首期整风班,就“未专门安排审干的内容”。^④北岳区第二期整风学习计划也未加入审干内容。^⑤中央对华北部队运动开展状况的总体估计是“整风与审查干部没有联系”。^⑥8月8日,北方局再次指示整风审干问题^⑦,此后相关工作逐步展开,至1945年夏运动大部结束。^⑧“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⑨运动在华北覆盖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参加的干部以地、县、区三级为主,在太行区个别县份还深入到了农村支部。^⑩一部分区党委级以上的地方高干被调至延安参加中央直接领导的整风。

审干的加入,给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首先,强调审干使学习重心发生了转移。运动的第一年,各级党组织都强调以学风学习为基础和重点。彭德怀这样解释:“整学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反对唯心主义”,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⑪然而,审干与整风结合后,为启发干部反省,中央开始偏重同现实联系更紧密的党风学习。1943年6月6日,毛泽东提示彭:前一阶段的整风“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党风学完后才实行审查干部”。^⑫其次,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在抽调干部集中整风时,人员的选择也因审干而带有针对性。冀鲁豫区党委曾表示,抽调干部时须“调一部分(约占2/5)可能有问题的,目的在于以整风机会让这些干部脱离主要工作岗位,专门整风,弄清政治面目”。^⑬一些地方还采取了随时发现嫌疑分子随时送去整

① 《太岳区组联会结论》(1943年3月30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51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2—33页。

③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审查与鉴定干部的指示》(1943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187页。

④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⑤ 参见《北岳区第一期整风学习的总结与今后整风学习的方向——四月十六日胡锡奎同志在北岳区学习委员会三次委员会上的报告和结论》,《晋察冀日报》,1943年4月20日,第4版。

⑥ 中央军委军政研究室:《敌后我军整风概况》(1943年6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207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1943年8月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590—591页。

⑧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终止于此。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的情况与延安不同,没有类似能够标志运动结束的事件。

⑨ 《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聂荣臻》(1942年7月4日),《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选编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⑩ 参见太行区党委办公室《一九四四年冬季几个支部整风的经验》(1945年12月)、区党委办公室:《一九四五年支部整风经验》(1946年6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编:《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351页。

⑪ 《彭德怀同志报告整风学习》,《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1日,第4版。

⑫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

⑬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向北方局、党中央的报告》(1944年4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风的办法。太岳区集中起来的干部中,有许多是“除原确定数目之外”各地委“自动送来”的。^①

讨论华北整风从“学习”转向“审干”时,还须注意两点。一是在运动进程上,华北与延安间存在约半年的时间差,有的地方时间更长。^②前述战乱问题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如时任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所讲,在频繁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整风不易按部就班、很有规律地进行。^③此外,各地党组织领会并正确践行中央指示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在晋察冀根据地体现得十分明显。1942年运动伊始,该区将整风视为“一般的公开的统一战线的学习运动”,在成立领导整风的学委会时,曾选举国共两党代表为正副主任。^④次年8月,毛泽东批评晋察冀分局“对整风至今没有正确认识”,对中央两个“四三决定”及各项整风指示“未曾认真研究”。^⑤1944年初,分局着手改造运动领导机关,决定“县级以上成立党内的整风委员会”。^⑥全区整风才步入中央设计的轨道。分局领导在检讨整风以来走“冤枉路”的原因时称:“高级领导机关满足于过去的工作成绩和‘模范’称号”,“形成严重的自由主义闹独立性的倾向”,“认为上级不了解情况,也不肯向其他根据地虚心学习,自称特殊,标新立异”。^⑦可见,地方党在执行中央指示时也有基于自身“特殊性”的理解及考虑,时间差的背后包含着中央与地方间的互动过程。北方局结合华北实际,起初计划自1943年8月至次年6月进行整风,之后开始审干,争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⑧但在中央不断督促及斗争形势变化的影响下,华北各地急于审干以追赶进度的情况逐渐显现。1943年底,北方局改变了数月前的安排,提出“不一定要在整风完结后才进行审查干部”。^⑨而下级党组织在实际操作时,不仅“两步并一步”,更有甚者只审干不整风,加重了运动中后期产生的“左”倾问题。

二是关于整风和审干关联的分析,学界对此曾存在争论。^⑩其实,审干乃整风之任务毋庸置疑,且运动从“学习”转向“审干”,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审干是革命年代中共的一项经常性组织工作。“干部确实整理清楚,党才有可靠的骨干”。^⑪然而,整风前的审干,效果不够理想。有的地方没按计划完成,“除填表之外,并未作出多大成绩”。^⑫这反映出中共难以充分了解干部之现实。晋西区党委曾这样反思:“干部问题的基本关键,在于具体深刻的了解干部情况”。可我们虽“有不少的调查统计材料,但很少从里面去发现与研究问题”,以致审查结论或鉴定做完后,

① 聂真:《关于太岳区工作给邓小平的信》(1944年9月14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20页。

② 例如,冀热边特委直到1944年春才部署所辖区域党组织的整风。参见中共冀热边特委《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与任务》(1944年4月),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选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年印,第215—216页。

③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546页。

④ 胡锡奎:《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1944年10月2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0页。

⑤ 《毛泽东关于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等问题给聂荣臻等的电报》(194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8页。

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1944年1月20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07页。

⑦ 胡锡奎:《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1944年10月2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72页。

⑧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1943年8月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589—590页。

⑨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的指示》(1943年12月24日),《八路军·文献》,第963页。

⑩ 参见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4—18页;张卫波:《“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学术研讨会综述》,《理论前沿》2004年第23期,第46—47页。

⑪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⑫ 参见《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节选)》(1944年),张玉鹏、张文杰编著:《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第266—268页。

仍不知受审查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干部”。^① 太行区也检讨过对干部能力了解“抽象”，致使鉴别出现偏差的问题。^② 整风中产生了大量反省材料，为党了解干部提供了机会。仅从弥补此前组织工作不足的角度上考虑，整风学习也容易朝审干方向发展。而且，战时审干还包括锄奸反特、清洗“托派”等内容。1943年6月初，毛泽东在向彭德怀谈及审干时，明确标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③ 同年11月，毛在给新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指示中，更是直接将这年8月15日颁布的审干指示称作“反特务斗争指示”。^④ 如晋绥某地委所述：“反特审干是结合为一的，均是整风的内容。”^⑤

二、探索方法

华北整风审干全面开展之初，彭德怀就说：“由于党内许多同志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缺点，又从未有过整风的传统和经验”，所以整风“是一件极端精细，非常艰苦的斗争”。^⑥ 为确保运动稳步前进并达到预期目标，中共作了一些部署。第二个“四三决定”将与审干结合后的整风运动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号召所有人“大胆说话，互相批评”；第二阶段开始“发扬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最后一阶段应审查干部的思想与历史，弄清其面目，并纠正其缺点。^⑦ 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便于发现干部群体中存在的问题。

1943年9月，彭德怀向正在北方局党校集中整风的20余名地委级干部传达了第二个“四三决定”精神^⑧，这批人返回各地后逐步将之付诸实践，结果出现了“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问题，对地方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三期整风班“在批评区党委进入高潮时”，有些干部称区党委在政治、组织工作上犯的“都是路线错误”。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亲自在大会上作了回应，才避免产生干部思想上的混乱。^⑨ 冀鲁豫军区团以上干部整风会议期间，新老干部一度出现对立。^⑩ 晋察冀文艺干部整风时，很多人对组织上有意见，“言词偏激，对一些事情捕风捉影”。^⑪

不过，各地对中央指示的反应也有不同。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主持分局做出了新的审干指示。^⑫ 该文件称，山东的干部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及“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⑬，实际上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的可靠。基于此种认识，分局并

① 《中共晋西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加紧审查干部与建立干部工作制度的指示》（1942年2月20日），《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3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175页。

② 赖若愚：《审查我们的干部政策、改造干部工作》（1943年9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赖若愚纪念文集》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对国民党现状分析及今后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八路军·文献》，第920—921页。

④ 《毛泽东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审查干部决定给邓小平等的电报》（1943年11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630页。

⑤ 《二地委整风的经验教训》，山西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晋档”），A44-2-37-1，第7页。

⑥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会议的讲演》（1943年9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747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0—32页。

⑧ 参见《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会议的讲演》（1943年9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750—752页。

⑨ 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12页。

⑩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上卷，大连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288页。

⑪ 王平：《王平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⑫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⑬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1943年10月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没有依照第二个“四三决定”所规定的具体方法部署审干工作，而是继续强调干部的思想改造问题。^①这样做并不违反中央指示，因为第二个“四三决定”也明确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②由此可见，以罗为首的山东分局领导人在执行中央指示时很注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1944年9月间，中央派舒同到山东任分局秘书长。他强调学习延安的经验，分局才开始以“民主检查”的方式贯彻第二个“四三决定”精神，但也是先试点，没有普遍展开。这主要因为罗荣桓和其他分局领导人对此存有顾虑。^③事实表明，罗荣桓等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在分局办公厅民主会上，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谩骂、挖苦领导，有的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人各占三分之一。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社长有专用马匹，喜欢吃辣椒，均被视为特殊化，马尾巴被割，炒辣椒锅被砸。^④见此情形，罗荣桓迅速采取纠偏措施，并遵循之前以改造思想为重点的整风审干思路，提出民主检查应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⑤这样便突出了领导干部自觉进行自我批评及反省的重要性，进而由上而下地把整风拉回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不仅党内过去“民主不够的现象”被打破，“群众都敢说话、提意见”了，而且使每个领导干部经历了一次“实际的思想教育”，并在群众监督下“逐渐更加改进，更加树起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把领导的水平也向前提高了一步”。^⑥正因如此，党中央高度赞扬了山东整风的成绩，要求各地学习山东的经验。^⑦罗荣桓作为地方党的主要领导人，能够因地制宜而不教条地执行中央指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非常可贵。

其实，发现干部问题的途径还有许多。自1943年春开始，为配合同国民党的斗争，整风增加了时事学习、阶级教育等内容。有的地方围绕相关话题组织讨论，从干部发言表态中寻找问题。晋绥分局曾向中央这样汇报：在讨论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问题中，更深入地识别了党员的立场及政治面目。^⑧还有的地方注意检查干部填表及学习情况。冀鲁豫区党委至1944年4月初，“从写履历自传与学习‘四三决定’过程中”，已发现“高级班和机关300个整风干部”里，“有政治问题者近30人”。^⑨

在进行整风审干时，中共十分注重运动的领导方法。整风期间，“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被反复强调，因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先解决认识上的问题，然后再组织实践”。^⑩思想领导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即整风动员、反省的启发和干部思想动态的把握。

整风伊始，必先对干部进行“动员、启发、教育，使大家真正知道整风的意义，鼓动起大家的热情来”。^⑪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的讲话就是一篇典型的“动员报告”。

^① 参见《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1943年10月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第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33页。

^③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312页；陈华鲁：《大众日报史话（1939—1949）》，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④ 《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15页。

^⑤ 罗荣桓：《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1945年3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⑥ 肖华：《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认识问题》，《展开反省与自我批评》，山东新华书店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9页。

^⑦ 谢有法：《整风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肖华同志》，《回忆肖华》编辑组编，《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⑧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19日），《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第121页。

^⑨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向北方局、党中央的报告》（1944年4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第283页。

^⑩ 赵守攻：《谈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洛阳市党史办编：《赵守攻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⑪ 赵守攻：《谈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赵守攻纪念文集》，第341页。

他首先指出中央号召整风之目的在于使“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通过介绍中共建党以来的斗争史及华北各地抗战以来工作中存在之问题，他解释了当前整风的时机和必要性。最后，其又针对前段整风的不足，对干部提出五点具体要求。^①这种动员是必要的，因为当时有的干部几乎是在对运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抽调整训的。^②

启发干部反省是思想领导的第二个方面。反省遇着“难关，这是整风发展必然的过程。指导的责任在于努力帮助打破这种难关”。^③中央规定的整风文献是干部反省时的参照标尺。然而，受限于文化水平，很多人都存在不完全理解相关名词、理论以及不知道如何联系实际等问题。1943年6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级干部整风会上联系华北党的情况，逐条解释了《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篇文献，“在启发同志们的反省上，在帮助同志们学习如何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以及如何把文件与实际联系上，均起了决定作用”。^④领导者在思想启发中还须注意分析本区干部队伍所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反省重点的提示。北岳区抗大二分校曾检讨：有些领导“没有认真的分析和估计干部在思想上究竟存在什么主要的倾向”，因而“形成有矢无的的现象，矢也就无从放起”。^⑤当然，最能推动干部反省的，还是领导者的率先垂范。晋察冀分局党校在动员干部反省时，分局领导人“现身说法”，使听众很受感动，“不觉得有压力”，都“自觉地进行自我思想斗争”。^⑥据怀涿县总结，凡整风较好的几个区，首要特点均是领导以身作则。某区委“将自己的缺点完全坦白出来，其余的干部就争先恐后地报名，愿在大会上坦白”。^⑦

反省中的干部会表现出各种状况，领导上就需要经常了解干部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动向”，要像“医生对病人每分钟脉搏跳跃的关心一样，给以适当的启发和教育”，否则整风“就会落空”。^⑧中共各级党组织在此方面确实下了功夫，对干部心态的把握比较准确。冀鲁豫区就指出，反省中干部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反省前害怕、反省中痛苦、反省后愉快。^⑨很多人确实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1944年7月，针对一些干部在整风反省中“对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开”，或“畏怯同志们对他的小视”等问题，罗荣桓在山东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一切”。他结合党史论证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之正确性和地位，并指出目前正因为是以此“为遵循的方向，而改造着整个的党”，参加整风的干部才应放下顾虑，抓住这一“最好改造个人自己的时机”，“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⑩

与思想领导同时进行的是组织领导，主要体现在干部集中后的编组和整风骨干的使用两个方面。

整风审干开始后，各地集中的干部数量很大。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1943年11月冀南区前

① 参见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3页。

② 参见邱新野《我的回忆》，中共阜新市委党史研究室1996年编印，第72页。

③ 张际春：《关于目前整风领导上几个问题》（1943年9月1日），《张际春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④ 杨献珍：《介绍北局地委会议整风学习的经验》（1943年11月），《山西革命根据地》1991年第4期，第12页。

⑤ 李志民：《半年来干部整风学习——摘录抗大二分校五期预科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一段》，中共晋察冀北岳区党委编：《战线》第101期，1943年1月15日，晋档，B2-0447，第50页。

⑥ 刘苏：《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学习的回忆》，《刘苏》，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印，第241页。

⑦ 《怀涿县一九四四年组织工作总结》，《涿鹿党史资料汇编》第1集，中共涿鹿县委党史研究室1990年编印，第231页。

⑧ 胡锡奎：《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1944年10月2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74页。

⑨ 苏振华：《整风报告》（1943年12月2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第115—116页。

⑩ 罗荣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4年7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35—236页。

往太行山整风的干部有 700 余名。^① 到 1944 年 9 月,冀南整风队人数增至约 1100 人,冀鲁豫整风队有 1000 多人。两队干部被合并至平原分局党校。^② 太岳区仅整风学校就集中了 868 名干部。^③ 如北方局所言:“干部是从各个不同岗位中临时调集而来,平日缺少工作与生活的联系,不易在整风中收到更好的相互批判相互帮助之效。”^④ 据参加太行区第二期党校整风班的时任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回忆,她所在的整风小组由多地多部门干部混编,“大家平时不在一起工作,所以进行批评时也不了解彼此的情况,主要是根据每个人自我批评的情况提提意见”。^⑤ 为解决这种问题,有的地方将干部按部门或地域划片分组,确保人员相互了解,以期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深入展开。不过,还有党组织认为,应“以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工作经验划分小组”。^⑥ 后者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同组内若干部文化水平、工作阅历不尽一致,在运动中亦难“交锋”。而且即便按地区分组,组内干部亦可能“来自不同单位,各有不同整风基础”^⑦,致使运动进度不易把握。可见,分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对各地取得经验的评价也见仁见智。

整风骨干的准备也十分重要。北方局曾强调,审干前必须“首先巩固我们自己的防御阵地”,即确保日后可能成为运动骨干的人员是“绝对可靠的干部”。^⑧ 一般说来,两类人容易成为整风骨干,一是历史清楚、本人无大问题的;二是工作于党政军系统的组织、人事或锄奸保卫部门者。据一位曾参加晋绥八地委整风的干部回忆,他本人是“第一二个通过审查顺利过关”的,然后“便成为分队的积极分子,多次参加校部召开的分队长和班长会议”。参会骨干中,有几人是“公安机关派来的学习人员,他们和校部掌握着重点对象的全部材料”。^⑨ 太行区党委党校整风班的组长多由县委书记或军队干部、保卫干部、公安局长担任。上级在各组还设有辅导员,“一般是在前面的整风中选拔出来的比较过‘硬’的干部”。^⑩ 但这种安排也容易导致“左”倾“经验”的传播延续。后来区党委在总结整风审干中的偏差时,就提到这个问题。^⑪

三、“反省”与“坦白”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的三大作风之一,通过整风期间以“反省”“坦白”为主的广泛实践,中共将其树立为自身的党建传统。为使农民出身占多数的党员干部群体对“反省”的精神和实质加深理解,中共形象地以“脱裤子”“割尾巴”作比。“脱裤子”须不怕出丑,因为裤子里躲着三风不正的尾巴。“割尾巴”意为勿怕痛,尾巴“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⑫ 整风文献公布后,相关学习

① 冀南革命斗争史编审委员会编:《冀南革命斗争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5 页。

②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8 页。

③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3 页。

④ 《中共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1943 年 7 月 9 日),《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2 日,第 1 版。

⑤ 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 年第 3 期,第 93 页。

⑥ 勇为:《整风经验介绍》,二地委:《整风的两个经验——经验介绍之六》(1944 年 4 月 1 日),石家庄市档案馆藏,1-1-25-2,第 2 页。

⑦ 古丁:《小组学习方法初步小结》,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组教科编:《整风资料》第 4 期,1945 年 1 月 20 日,河南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豫档”),G07-01-41-01,第 1 页。

⑧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1943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第 590 页。

⑨ 武常毅:《风雨生平录》,出版信息不详,第 38 页。

⑩ 阮章竞口述,贾柯夫、方铭记录整理:《异乡岁月:阮章竞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9 页。

⑪ 参见张磐石《关于干部教育工作——如何继续完成整风与今后新的干部教育计划》(1945 年 2 月在地组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党的建设》,第 398 页。

⑫ 《教条和裤子》,《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9 日,第 1 版。

分为“粗读”“精读”两大阶段，而“精读即包括着反省，离开反省，即无所谓精读”。^① 故“反省是整风的关键，没有反省便谈不到思想改造”。^②

然而，整风伊始，反省这个核心环节就出了问题。一方面，由于这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党员干部思想意识修养的一种新方法，很多人不知具体应如何进行。不同文化水平的干部，其反省各具不足。山东分局党校检查学员反省笔记后发现：“文化水平高的，笔记都写得空洞，议论多，反省少”；工农干部虽一提笔就反省实际，但“不能在认识上展开”；一般文化程度干部则“议论不像议论，反省不像反省”。^③ 另一方面，如北方局机关的一位干部所述，即使在学了整风文件、对自身错误已充分认识之后，欲作“深刻的反省也还是不容易的”。^④ 毕竟“脱裤子、割尾巴”“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⑤，不少干部对其担心甚至抵触。运动初期，“普遍的特点”是“光读文件，不反省自己”。还有人提出“在实际工作中整风”，意为“工作做好了就是整好了风”。^⑥ 为推动反省，1943年初北方局从过去一年的干部笔记中挑选了四篇典型，汇成一本名为《思想反省选集》的小册子，分发各地。此后有干部的反省内容虽发出“党八股的气味”，“从反省选集的公式出发”^⑦，但这种示范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过反省，一些干部表示在思想意识上有所提高。时任太行三地委组织部部长王谦表示：原来我“总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行。一整风，一进行反省，可不是那么一回事”。经过整风，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缺点和毛病，“真正是反省到深处了”。^⑧ 与他同批参加运动的干部，也大多认为整风反省“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比较深刻的全面地认识了自己”。^⑨ 在晋绥八地委集中整风的一名干部也说：过去“搞抗日、干工作主要凭的是觉悟和热情”，这次整风“使我思想豁然开朗”，通过在反省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体会得深刻多了”。^⑩

随着审干问题被日益强调，“反省”开始向“坦白”发展。虽然二者一脉相承，但仍有区别，主要是侧重点不同。处于“反省”层次的“自我批评”，偏重于揭露思想意识问题。北方局所选反省范例中，每个干部都结合成长经历，以剖析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落脚点。^⑪ 事实上，整风初期中央并不提倡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过分关注个人的细枝末节问题。“有的放矢”中的“的”，主要指“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毛泽东曾表示：“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⑫ 北岳区抗大二分校在总结整风时也批评道：干部反省“多停留在日常生活细节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方式问题上”，“有的竟完全离开文件专在日常生

① 杨献珍：《介绍北局地委会议整风学习的经验》（1943年11月），《山西革命根据地》1991年第4期，第4页。

② 思汉：《总直整风动员大会记》，北局集总直属机关学委会编：《整风周报》创刊号，1943年11月27日，晋档，B4-0062，第18页。

③ 《山东分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经验介绍》（约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鲁档”），G001-01-0098-003，第6页。

④ 刘清训：《漫谈反省中的内心斗争》，《论思想意识》（整党参考材料），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104页。

⑤ 《教条和裤子》，《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第1版。

⑥ 献珍：《对整风认识的检察》，《整风周报》创刊号，1943年11月27日，晋档，B4-0062，第11—12页。

⑦ 李培南：《分局党校讨论反省自传的介绍》，《论思想意识》（整党参考材料），第116—117页。

⑧ 王谦在1991年6月的谈话，转引自张国祥《山西抗日战争史》下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⑨ 《北局关于北局党校（即地委会）整风学习的总结与经验》，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党的生活》第66期，1943年11月5日，晋档，B2-0250，第1—2页。

⑩ 李立功：《往事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

⑪ 参见中共北方局编《思想反省选集》，中共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1943年翻印。

⑫ 《把“矢”拿稳把“的”认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4日，第1版。

活零碎问题上打圈子”。^①

发展至“坦白”层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强调向党毫无保留地反映问题。晋察冀分局领导人这样阐释：对党坦白“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的表现”。“每个党员把自己所做过、见过、听过、想过的，都要忠实地告诉党。同时，坦白不仅是对于个人的一切，作‘洁身自好’的表现就算完了，举凡对于周围的同志，对于领导上的意见，都应全部告诉党。因此，坦白运动是一个党员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他的‘新我’与‘旧我’的斗争”。^②

组织上发出“向党坦白”的号召后，干部群体的反应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如平原分局六地委总结，干部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前进的积极分子”，“占极其少数”；第二种是在前进与倒退之间动摇着，“占绝大多数”；第三种是落后的，“也占极少数”。^③ 后两种人对坦白是顾虑甚至抵抗的。有的地方曾归纳坦白初期干部的几种心态及表现：问题严重者担心受组织处分，党籍不保。问题稍轻者也顾虑坦白后个人威信、形象受损。有的人抱着侥幸心理，“我不说谁也不知道”。还有的认为其问题“联系别人，说出了他有伤情面”。更有甚者干脆采取对抗态度，认为自己的老毛病坦白也改正不了。^④ 对绝大多数“动摇”的干部来说，即使坦白也难一次彻底。山东分局党校领导人总结了不彻底坦白的现象：避重就轻，有所保留，捏造历史，夸大自身革命性，承认事实、但不上升到一定思想原则或承认大原则无具体事实，等等。^⑤

面对以上情况，前述“两种领导”就发挥了作用。在各种具体方法中，“典型示范”被经常使用，效果明显。冀鲁豫区党委注意重点教育“有问题的分子，使其觉悟，准备在将开展的坦白运动中放头一炮”。^⑥ 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从典型发言开始即开展了大胆之自我批评，两天即形成运动”。“每个典型发言都对大会起了推动作用”，且干部大都“围绕着几个典型”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⑦

经过领导推动及深入自我批评，干部队伍的问题逐步显现。太岳区在第一阶段党风学习后，就发现干部有贪污、政治动摇、被捕变节、隐瞒成分和年龄、冒充学历、修改党龄及履历、泄露秘密等问题。^⑧ 晋察冀平西地委整风班第二轮坦白结果显示，有政治方面问题的占 33.3%，有社会关系、个人履历方面问题的占 8.3%，有品质道德方面问题的占 40.4%，有思想意识方面问题的占 23.7%。有的干部坦白出不止一种错误。^⑨

其实，中共干部群体的上述问题并不是在整风时才首次显露出来的。几年前“巩固党”期间，各地已“洗刷”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如一位干部所言：“臭包袱每人不同程度地都有点儿。”^⑩ 面

^① 李志民：《半年来干部整风学习——摘录抗大二分校五期预科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一段》，《战线》第 101 期，1943 年 1 月 15 日，晋档，B2-0447，第 50 页。

^② 《开展坦白运动，是我们整风新阶段的中心任务——刘澜涛同志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分局军区直属各机关干部大会的讲话》，河北省档案馆馆藏（以下简称“冀档”），578-1-11-5，第 8 页。

^③ 冀鲁豫分局六地委会：《地委整风班第五期学习总结》（1945 年），鲁档，G052-01-127-1，第 6 页。

^④ 王奇：《学习时事反省态度检查》，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组教科编：《整风资料》第 4 期，1945 年 1 月 20 日，豫档，G07-01-41-01，第 8—9 页。

^⑤ 李培南：《分局党校讨论反省自传的介绍》，《论思想意识》（整党参考材料），第 116—117 页。

^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向北方局、党中央的报告》（1944 年 4 月 6 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下，第 283 页。

^⑦ 李雪峰：《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的思想与思想领导总结》（1944 年 1 月），《党的建设》，第 360—361 页。

^⑧ 刘锡五：《关于太岳区整风情况向党中央的报告》（1945 年 1 月 25 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 630 页。

^⑨ 武光：《赶上去！——在中共平西地委党校整风班开学典礼的报告》（1944 年 7 月 2 日），《征程漫漫——武光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115 页。

^⑩ 刘苏：《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学习的回忆》，《刘苏》，第 241 页。

对坦白出的大量问题,领导上本应予以调查研究,冷静分析。但在残酷的战争状态下,高度紧绷的对敌斗争神经容易使领导者对问题产生过分估计。例如,1943年9月,太行分局电示冀南区党委:“从地委县委同志整风中看出党的思想紊乱达到惊人的程度”,“要足够估计敌特国特对于冀南党的危害”。^① 上级这种对形势的判断,也成为冀南整风审干日后出现问题的催化剂之一。

不过,大量问题的暴露,也说明中共整风审干之必要。而统一思想,特别是统一干部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及态度,则显得更加紧迫了。在中日两国民族战争的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党员属于“抗日党员”,“是为了打日本、争民主而加入革命的”,只有民族观念^②,“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③ 据太岳区整风学校统计,在未深入学习前,干部“对国民党、蒋介石有很多糊涂观念”。640人中认为蒋是民族领袖、伟大人物的占1/3,认为蒋抗战即是不反共的占18.2%,认为蒋是自动抗战的占27.8%。^④ 太行区也发现,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有干部对党的观点表示怀疑。^⑤ 此类认识上的模糊甚至摇摆,很不利于中共当时及日后与国民党展开政治角逐。因此,中共下决心改造干部思想,加强其阶级意识,力求保持进而提升组织的战斗力。

通过发动反省坦白,中共在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改造了干部。平原分局书记黄敬曾说:整风中“最有收获的”是“自我批评武器举起了”,“把不敢见天日的事公之于众了”。^⑥ 太岳区总结称:经过坦白,干部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很多同志也找出了自己的主要毛病,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或大或小的克服,在这个克服过程中就有了进步”。^⑦ 此阶段的运动虽有问题,但总体仍较平稳。如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向中央汇报的那样:有的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不过还未出现“违反政策的倾向”。^⑧ 据当时平原分局党校一位整风组长王仲儒回忆,其组内有一名干部说不清自身经历,“交代了又推翻,推翻了又交代,反复十多次,态度很不诚实”。小组采取严肃态度,没给其扣帽子,也未隔离审查。最终上级决定“暂不做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⑨ 可见,这一阶段的整风纵然紧张,却不属所谓“过火斗争”之范畴。

四、“抢救”干部

1943年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后,延安各机关开始公开广泛地审干和反特。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反特斗争动员大会上做了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渲染“特务如麻”的紧张气氛,“使延安立即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特运动,即‘抢救运动’”。^⑩ 这是前段整风审干的继续,相关做法也传到了华北各地。

“抢救运动”在华北四大根据地并非同步掀起,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渐次展开。紧邻陕甘宁边区

① 《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关于冀南工作指示电》(1943年9月7日),《冀南历史文献选编》,第471页。

②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香港,新风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④ 郭钦安:《整风学校工作总结》(1945年5月23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87页。

⑤ 参见张磐石《从整风看干部思想与干部教育——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党的建设》,第380页。

⑥ 《黄敬同志在区党委整风中心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44年4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下,第298页。

⑦ 王鹤峰:《从最近学习情形谈起今后要怎样学习——在审干开始时的报告》(1944年6月1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05页。

⑧ 刘锡五:《关于太岳区整风情况向党中央的报告》(1945年1月25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28页。

⑨ 王仲儒:《忆平原分局党校整风》,《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四川联络组1987年编印,第107—108页。

⑩ 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4页。

的晋绥根据地行动最早。1943年8月,分局向各地委布置了整风反特工作,约两月后转入“抢救”。^①不久,相关经验传入太行根据地^②,影响到北方局机关及党校、太行区党委党校、冀南整风队等多个单位。晋察冀的“抢救运动”自1944年春开始。^③山东的情况相对特殊。由于罗荣桓的抵制,“抢救失足者”这一“口号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④,但该区整风审干在1944年秋后一度出现扩大化问题,其实也带有“抢救运动”的部分特征,只不过山东分局自主纠偏十分及时。晋冀鲁豫根据地中的冀鲁豫区,因审干开展较晚,吸取了太行等地“左”的教训,几乎没有将反特运动付诸实践,审干搞得比较平稳。^⑤此外,“抢救运动”未蔓延至一些基层单位。^⑥像晋西南这样非中共控制区域的党组织,也根据自身斗争需要,没有大搞“抢救”。^⑦

“抢救运动”扩展至华北各地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当时中央政策指示或经验举措的传达与推广确实因地理及战乱阻隔而需要时日。不仅如此,地方党的自主性也随着同延安在空间距离上的拉大而有所增强。晋绥根据地临近中央,康生常对之进行指导,在临县搞了一个“抢救试点”^⑧,还不断提供“特务”的“线索”。^⑨其报告也是该区干部的学习文件之一。^⑩而《抢救失足者》小册子寄到山东时,罗荣桓看过却表示“不要向下分发”。^⑪后者明显可以更加灵活地开展工作。不过,地方自主性的增强并非意味着中央权威的削弱。运动期间,中央派遣了几位干部赴华北各处指导整风,本意是加强领导,不想倒推动了“抢救经验”的扩散。^⑫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对中央及其派员的尊重与盲目服从。

当然,“抢救经验”被推广至华北并得到响应,也与斗争形势愈发紧张有关。自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及国民党加紧反共以来,各根据地因特务奸细破坏而受到很大损失。北岳区某地委所属各县,1942年9月至12月,损失了约1/6的干部,48%的被捕者系因“奸细告密”而陷于敌手。^⑬冀南区在1943年6月表示:“我们一切组织建设有被特务摧垮之危险。”^⑭太行区的特务活动也很猖獗,经常“割电线、放毒、打黑枪”^⑮,还发生国民党女特务勾引八路军警卫人员,企图放毒谋害彭

① 《关于整风审干的检查及今后的方针——林枫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年7月7日),晋档,B4-0070,第3页。

② 参见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03页。

③ 参见王建中《军旅足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④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311页。

⑤ 王宏坤曾先后考察过北方局党校、冀南整风队和平原分局党校的整风审干情况。经过比较,他认为“平原分局党校的整风运动搞得稳妥得多,成功得多”。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⑥ 参见李慧德《五台县级机关整顿“三风”概况》,《难忘的岁月》,中共五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时间不详,第132—138页。

⑦ 中共孝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甘一飞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⑧ 李大钧、李大宏:《云中骄子赵革非》,《大同文史资料》第31辑,大同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76页。

⑨ 参见刘惠农《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张庆泰主编:《忆林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张稼夫:《庚申忆逝(之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⑩ 参见赵展山《我在河曲的革命活动》,《河曲文史资料》第1辑,河曲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编印,第38—39页。

⑪ 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311页。

⑫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王建中:《军旅足痕》,第159页;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第311页;陈华鲁:《大众日报史话(1939—1949)》,第232页;刘星宜:《杨奇清传》,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⑬ 《干部严重损失的经验教训》,《战线》第101期,1943年1月15日,晋档,B2-0447,第52—53页。

⑭ 《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今后十个月的工作方针》(1943年6月1日),《冀南历史文献选编》,第448—438—439页。

⑮ 杨蕴玉:《抗战时期我在辽县工作的回忆》,《左权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1辑,左权县史志办公室1987年编印,第22页。

德怀的事情。^①面对如此形势,六七月间中央接连向全党或华北发出指示,反复强调清查内奸问题。^②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党的领导机关对局势的基本判断自然与中央保持一致。1943年9月,彭德怀在讲话中就提及“拯救某些失足分子”的问题。^③邓小平继任北方局书记伊始,“立即抓整风运动,展开审干反奸的斗争”。^④

此前干部坦白的情形表明,大多数人都存在“突破口”。不过,首当其冲的还是知识分子干部。1943年中央给华北的几份反奸指示中,多次强调抗战后打入党内的奸细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高等特务,难以清查。^⑤在这种导向下,有的地方出现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情况。据回忆,冀南整风队搞“抢救”时,“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就怀疑他是特务,询问发展人是谁。若对方否认,就以“特务都发展知识分子”为据继续追问,导致“知识分子出身的学员都不愿说自己是知识分子”。^⑥八路军军工部也把一些知识分子搞成“特务”,^⑦有些被关进“隔离室”。^⑧晋绥区兴县县委的“整特”首先从文教部门打开缺口。“很多工农出身的干部看知识分子就不大顺眼,运动一来,首先就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⑨

另一类“抢救”重点是从国统区、敌占区进入根据地且历史复杂的干部。与此相对,红军干部和一直在根据地内工作的干部,一般容易过关。曾在晋绥八地委亲历运动的李立功表示:“像我们这些从根据地去参加整风的干部,没有在敌占区呆过,没有被捕坐过牢,比较清白,在审干中是积极分子,属于依靠对象。被审查的主要是那些从敌占区来的或曾经被敌人抓捕过的人。”^⑩刘华清也说:当时“那些过去在白区工作过、在白区入党、在根据地搞过地下工作的,都要说出通敌的事儿。我很幸运,我是红军,没整到我头上”。^⑪至于兼有以上两重身份的干部,其在运动中更要面对重压。

“抢救运动”加剧了党内的紧张气氛。太行区党委在1944年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干部坦白的“高潮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领导同志,高度地提起了全党的警觉”。^⑫但这种过度警惕很容易导致怀疑范围扩大,产生冤假错案。当时经“查实”的“特务”可能面临严厉惩处。冀南五分区的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都被整成“大特务”。^⑬据说北方局保卫部最初提出将二人“定为死罪”,后来中央

^① 彭雪枫:《严重警惕——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词》(1943年9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彭雪枫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② 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78页;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第73页。

^③ 《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彭德怀在北局党校地委会议的讲演》(1943年9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749页。

^④ 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⑤ 参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276、278页。不过,中央的观点也不无道理,日伪在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就以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青少年为主要政治宣传对象。参见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第89页。

^⑥ 王佃臣:《向着最后的胜利》,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1页。

^⑦ 张贻祥:《太行十年的几次接触》,陈建辉、袁树峰主编:《邓小平与河北——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⑧ 李滔、易辉主编:《刘鼎》,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⑨ 周士元:《踏遍青山不觉累:李昌传》,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⑩ 李立功:《往事回顾》,第102页。

^⑪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⑫ 《中共太行区党委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⑬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第123页。

纠“左”方针下达才使他们免于一死。^①面对巨大压力，一些干部背上了思想包袱。冀南整风队有人“总想不开，老是哭，把眼睛都哭坏了”。^②更有甚者萌发轻生之念，而自杀在那时被视作“威胁党”的手段。^③不仅组织上有这种认识，参加运动的许多干部也持有类似观点。太行区党委党校整风班的一位干部意外身亡，消息传开后学员“群情激愤”，认为“自杀就是叛党，要求开批判大会”。^④党内“左”倾情绪的弥漫可见一斑。

“左”的问题还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干部对组织以及干部间产生互不信任甚至对立现象。就连尚未进行反特的平原分局党校，也因冀南整风队的并入，形成“草木皆兵”的气氛，“只相信自己人不相信其他人”的情绪蔓延，且在同级干部中也“发生了老干部对新干部，工农对知识分子，部队对地方不信任与对立”。^⑤至于其他根据地，运动给干部和组织造成的冲击更重。如太行区党委总结的那样：“受了整风审干中左的刺激”的干部，情绪“一般是不易转变的”，容易对组织产生“怀疑与反感”。^⑥上述问题也为国民党所利用。晋绥八分区的一名干部，在分局党校整风中遭受打击，被派到太原做城市工作后叛逃。在国民党的一次政治作战会上，他专门介绍中共整风的“左”倾问题。国民党将其报告收入一本名为《中共现形》的小册子出版，以丑化中共形象。^⑦

“抢救失足者”在党内进行的同时，也向党外蔓延。据称，晋绥分局所驻村庄，一度几乎全村人都被指为特务。^⑧冀鲁豫区党内整风审干搞得比较平稳，边区第三中学却酿成了反特扩大化的悲剧。^⑨社会上锄奸反特运动的扩大可能引发群众恐慌。1944年7月末，毛泽东略带担心地询问各地：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等运动，对“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⑩面对集中出现的问题，地方党的部分领导人已感到事态严重。他们虽未无动于衷，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也没有勇气公开提出反对意见。^⑪因此，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指示了。

五、纠正“左”倾

1943年春延安大规模审干时，中共就察觉运动中存在“左”倾问题，并有纠偏指示陆续出台。7月1日，毛泽东提出防奸的两条路线，正确的是“九条方针”，错误的是“逼、供、信”。^⑫8月15日，中央又对“九条方针”作了具体阐释。^⑬随着各地群众性锄奸反特和党内“抢救运动”日益出现“捉

^① 刘建章：《我的九十年（1910—2000年）》，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② 王佃臣：《向着最后的胜利》，第81页。

^③ 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第191页。

^④ 李琦、刘志辉：《亲历太行整风——原太行区左权县委书记杨蕴玉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第93页。

^⑤ 《平原宋（任穷）、黄（敬）等关于整风审干偏向致北方局电》（1944年9月28日），鲁档，G052-01-0298-001。

^⑥ 张磐石：《从整风看干部思想与干部教育——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党的建设》，第391页。

^⑦ 参见张鉴《中共怎样整风》，《中共现形》，爱国出版社1946年版，第25—34页。

^⑧ 张成德、孙丽萍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第3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⑨ 参见《“反特事件”始末》，中共菏泽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校史编委会编：《战火中的摇篮——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169页。

^⑩ 《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99页。

^⑪ 参见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第123—124页；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第114页。

^⑫ 毛泽东：《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943年7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页。

^⑬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9—96页。

多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损伤了人”^①等严重错误，中央自11月起接连给华北及其他根据地下达了更有针对性的纠“左”指示。综合几份文件内容，其要点如下：

一是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则。1943年11月，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指出根据地内的反特“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的特殊性”，“如果要强调的话，则应懂得正是在前方战争环境中，更应执行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在严重环境下正确地保证反特务胜利”。^②同年底，中央在致华中局、山东分局的电报中，不仅具体解释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则，还阐明禁止杀人的意义：如此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③次年二三月，中央又先后提醒北方局、山东分局注意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则。^④

二是叫停群众性“抢救”大会，反对无限追查所谓“特务”问题。1944年5月，中央指示：在已进行群众性坦白、反奸运动的地区，应适当暂停坦白大会，“使干部脑子冷静一下”。运动尚未深入的地方，“不要采取抢救运动的方式”，而应“采取整风学习、自我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形式。中央还强调：“即使坦白出特务问题，如果没有确实证据，或有证据而无紧急处理之必要时，亦可暂时不加深追”。这样便于启发坦白者自觉性，解释宽大政策。^⑤面对“左”倾问题的继续蔓延，同年秋，中央明确指示北方局及太岳区“立即停止坦白运动”，“如果没有确实证据，对于一切坦白分子一律不要加以追问”。^⑥11月26日，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在重申上述精神同时，要求“经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与变相肉刑”等行为。^⑦

三是提出甄别“特务”，平反冤假错案。1944年1月，中央书记处指示各地：根据延安经验，已坦白者大致可分为六类：职业特务、变节分子、有党派问题的人、被特务利用和蒙蔽者、犯党内错误的人、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职业特务是极少数”的，故对所有坦白分子要进行复查，根据其结果加以平反。^⑧须指出的是，甄别其实并非专门的纠“左”措施，而是正常锄奸反特工作中的固有环节。因此“抢救”中个别思想“左”倾者认为：“坦白阶段不必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只是甄别阶段的事。”^⑨中央提出复查，意在加强调研，其还多次提醒各地绝不能轻信口供。^⑩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的指示》（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508页。

② 《毛泽东关于认真执行中央审查干部决定给邓小平等的电报》（1943年11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630—631页。

③ 《关于在反特斗争中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的指示》（1943年12月27日毛泽东、康生致华中局等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40—141页。

④ 参见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510页；《中共中央北方局》综合卷，第283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的指示》（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510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反奸斗争中防止扩大化的问题给王鹤峰同志的指示》（1944年9月13日），《太岳抗日根据地重要文献选编》，第616页。

⑦ 参见《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01—402页。

⑧ 《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59页。

⑨ 王林：《抗战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⑩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纠正反奸斗争中“左”的错误的指示》（1944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第509页；《中央书记处关于审干反奸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02页。

北方局及各分局对中央系列纠“左”指示十分重视。邓小平不仅及时表态，还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相关工作，重申中央强调的稳健方针，并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阐释宽大政策。^①不过，有的地方在把握中央纠偏政策方面经历了一段摸索。^②到1944年下半年，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纠“左”逐渐显出成效。平原分局领导人此时向北方局提出对过去整风审干做一结论“以便向下级传达解释”的建议，还申请为运动中的几个被重点怀疑的干部做结论。^③

在各种纠“左”措施中，甄别平反与干部的个人利益最为关切。了解到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后，一些干部开始否认或部分否认此前“坦白”的“事实”。晋绥某地委396名“坦白分子”中，有173人“翻供”。^④一个地委就须复查数百名干部的各种问题，足以说明甄别平反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各地在此方面均作了不少努力。晋绥的“抢救”爆发较早，善后工作也先于华北其他地方。1944年2月，分局党校已开始调研。为配合甄别，党校四部全体学员移至公安总局驻地。^⑤晋冀鲁豫有的地方还召开了“平反示范大会”^⑥，以扩大影响。

华北各地执行中央新指示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党内基本实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目标，被集中起来的大批干部获得安置，其中也包括“坦白分子”甚至“特务分子”。例如，平原分局从1944年秋起着手整风收尾及干部安置工作。对于“坦白分子”，分局首先进行安抚，指示各地委在他们到岗后继续对其“进行耐心的教育”，并“在政治上生活上多方注意”，“在态度上不应有丝毫的轻视、冷淡或刺激”，对其家属亦应予以适当照顾与解决。在分配工作方面，分局提出，“应注意其工作位置，不能低于原来的工作位置，以免得他们的怀疑”。^⑦至于“特务嫌疑严重”者之处理，分局领导人给出的意见是“游动工作”^⑧，即调离原岗。不过，对于地方中高级干部来说，“身负悬案”仍对其任用造成一时影响。据回忆，冀南区四地委领导人王任重在整风中被怀疑为“托派”，致使黄敬有意调其担任分局宣传部长“未果”。后来王赴延安，问题得到甄别，组织上做出结论，他才得以重返冀南，继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⑨

很多干部与王的情况不同，虽获得工作，但组织上未做出明确结论。这也表明此次甄别平反遗留一些问题。在中共的运作传统里，党组织给党员的鉴定结论具有很大效力及权威性。正因如此，审干中不少干部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结论问题。虽然做结论不等于平反，但干部毕竟能据此了解组织上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且若本人确无问题，一纸结论更能让干部以“清白之身”投入工作。诚如有人所考虑的，“如没有结论，如何出去工作呢？”^⑩然而，当时确有一批干部是在未获结论的情况下重新工作的。晋绥某地委对“翻供”干部的复查结果显示，明确查清消除嫌疑的仅占不足20%，其余均是“未查清或未作结论者”。^⑪产生这样的问题，有主观两方面原因。

从主观上看，一些领导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负责干部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太行区党委

① 参见杨胜群、闫建琪主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卷，第496—498、511—512页。

② 参见《中共太行区党委一九四四年工作总结》，《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第369页。

③ 《平原宋(任穷)、黄(敬)等关于整风审干偏向致北方局电》(1944年9月28日)，鲁档，G052-01-0298-001。

④ 《二地委整风的经验教训》，晋档，A44-2-37-1，第10页。档案原文中将“翻供”误写作“反供”。

⑤ 周少卿：《九十行过——任子良纪略》，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⑥ 参见《对过去十个月来整风审干工作的检查和如何开展今后的甄别工作——董玉同志在平原分局党校第三大队全体党员大会上的报告》(1944年11月5日)，鲁档，G052-01-0258-003，第4页。

⑦ 《分局组织部对整风后的同志的教育意见》(1944年9月18日)，鲁档，G052-01-002-004，第1—2页。

⑧ 《平原宋(任穷)、黄(敬)等关于整风审干偏向致北方局电》(1944年9月28日)，鲁档，G052-01-0298-001。

⑨ 宋任穷：《悼任重同志》，《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98页。

⑩ 理京、理红整理：《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8页。

⑪ 百分比系本文作者统计，参见《二地委整风的经验教训》，晋档，A44-2-37-1，第10页。

就批评一些领导者,纠“左”之后“不理解新事物而迷恋于旧的一套”,“不检讨自己”。^①类似问题在冀南整风队表现得更明显。“九条方针”下达后,领导上迟迟不组织参加整风的干部进行讨论,“决定不与他们见面”。^②后来,该情况被反映至邓小平处。负责整风的两位领导受到邓的当面批评,回去“立即组织召开了反‘左’大会”,“宣布成立甄别工作办公室”,相关行动才逐步展开。^③

从客观方面讲,战时诸多条件的限制确令调查取证难以有效开展,相关人员的牺牲或失联更有可能使个别干部的问题变成无法解决的悬案。因此,即使在党组织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恐怕仍难保证甄别平反的彻底性及所作结论的精准性。太行区对整风审干、反特运动遗留问题的数次甄别复查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亲历太行整风的干部称:区党委纠“左”后“放了一大批人”,“并进行过甄别工作”,但“不够普遍”。^④事实上,中央对此很重视。1945年初北方局准备移驻冀鲁豫之际,八路军总部^⑤与野战政治部两机关仍被要求留在太行,任务之一便是“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⑥这次清理不完全,是“因环境分割材料不足”。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区党委又组织了两次集中复审,后者规模较大,历时半年多,涉及干部1400余人,约占全区干部总数的20%,经调查做出结论者1339人。与前次复审相比,特务减少72人,特嫌减少335人。^⑦本轮复审的深入程度虽远超以往,但仍有近百人的问题未能解决。被复查的1000余名干部,恐怕也非昔日参加运动人员之全体。据回忆,太行区整风中个别被组织上认定为“特务”的干部,其情况实际极为复杂。能提供证据或线索的多位当事人在后来的调查中各执一词。相关问题直到1949年后中共再度审干时,经多部门联合取证才获“释疑”。^⑧

结语

1945年夏,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大部结束。虽然多地仍继续开办整风班或依托党校组织干部整风,但此时已回归“学习运动”,且学习的重点转向中共“七大”文献。^⑨可见,整风审干运动已事实上结束,然其影响却十分深远。

中共是一个旨在通过革命手段夺取并巩固政权,以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的革命政党。抗战对党的成长及建设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在广阔敌后区域开辟根据地,中共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还在此过程中迅速扩充党组织并壮大军事力量。但如何以党的意志和理念去整合、训练乃至

① 张磐石:《关于干部教育工作——如何继续完成整风与今后新的干部教育计划》(1945年2月在地组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党的建设》,第399页。

② 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第115页。

③ 郭森:《四十年风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196页。

④ 杨蕴玉:《抗战时期我在辽县工作的回忆》,《左权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1辑,第22页。

⑤ 八路军总部,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简称“集总”)。1943年10月,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署办公,此后主要指挥一二九师部队。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各军区由军委总部直接指挥。

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1945年1月23日),《八路军·文献》,第1057页。

⑦ 《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复审整风审干遗留问题的初步总结》,中共中央华北局建设编委会编:《建设》第40期,1949年9月25日,第8—10页。

⑧ 参见阴发祥《审干工作重在实事求是》,《阴发祥纪念文集》,济源市中共党史学会2005年编印,第131—132页。

⑨ 山东分局党校至1946年8月初,已办至第十九期。(参见《党校第十九期整风总结》(1946年8月),鲁档,C024-01-0383-001)晋察冀有的分区在1945年7月底时,还抽调干部整风。(参见李春溪《战时回忆和日记》,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编印,第58—92页)太行区党委党校第四期整风班至1946年3月15日结束,干部的整风学习材料中已增加了中共“七大”文献。(参见贾久民《太行党校第四期整风报告》(1946年7月),《党的建设》,第422—436页)

改造大批阅历各异、诉求不一的党政军干部，成为其必须面对和完成的课题。毛泽东曾敏锐地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审干”本是中共的一项日常性组织工作，但当其与“整风”结合之后，效能大大提高，同时也解决了整训干部这一党的建设中之核心关键问题。由于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法的干部思想教育及改造受到高度重视，中共通过整风审干，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时干部集训方法，为日后的党组织整顿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曾领导过北方局整风的邓小平这样讲：“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运动在华北广阔区域是由北方局及各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指示领导进行的，步骤和方法与延安基本一致，这展现了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③的中共所具备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不同于延安的是，华北地处敌后，运动展开的速度及程度受到动荡战争环境的制约，各根据地结合自身实际安排相关工作的具体情形也有区别。这种复杂性表明，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层级众多、党员干部数量巨大的政党而言，在党内开展大规模运动，犹如建设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故而其间出现偏误恐怕在所难免。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是多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华北的情况来看，中央在延安积累整风审干经验的同时，还关注着运动在各地的开展状况，常指导督促。而客观环境差别容易造成根据地相关工作晚于延安的问题，甚至给人以“落后”的感觉。为了追赶中央的步伐，地方党的领导人有时会产生急躁冒进情绪，盲目照搬延安的经验，紧张的战争环境也使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可能出现偏差。不过，中央的纠偏较为及时，地方党组织进行的具体甄别工作同样有一定成效。整风审干在华北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共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艰难繁复，还展现了当时党的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间比较顺利的互动与协调。这一过程本身，亦锻炼了中共各级干部从不同实际情况出发查找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党领导革命战争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作者程斯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②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年6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51页。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